

# 文明冲突、文明对话、发展模式

## —— 9·11 与阿拉伯思想文化

吴冰冰

(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9·11事件和随后西方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对中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此, 阿拉伯世界在政治层面做出反应的同时, 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矛盾将如何解决? 是按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任其发展下去, 使西方、东方都受害, 还是以文明对话的方式来解决, 使双方都受益。对此目前虽有分歧, 但放弃冲突, 走文明对话之路已成主流, 也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 美国; 伊斯兰; 文明冲突; 文明对话

## Civilization Conflict and Dialogue with Development Pattern —9·11 and Arabic Thought and Culture

Wu Bingbing

**Abstract:** 9·11 Incident and the military striking against Afghanistan affected the situations deeply in the Middle East, even in the world. Arabic countries make political responses to the situation, and then carry on widespread and profound ideological discussion. How to 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Islamic civilization? It seems that the dialogue between civilizations is the mainstream and it's the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Key words:** dialogue; culture ;Islamic

2001年9月11日, 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对中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首当其冲, 面临严峻考验。阿拉伯世界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有杂志评论说: “在美国城市遭袭两个多月后, 国际关系乃至整个国际新秩序变得同2001年9月11日以前不一样了。遗憾的是, 那些事件给西方与伊斯兰的关系投下了浓

重的阴影, 而这是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阿拉伯世界在政治层面做出反应的同时, 在思想文化层面开始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黎巴嫩议员纳赛尔·金迪勒博士在题为《恐怖主义定义与种族隔离》的演讲中指出: 西方将某个行动谴责为恐怖主义, 并不是因为该行动本身, 而是因为它是阿拉伯人所作的。“他是恐怖分子, 因为他是阿拉伯

人，他所进行的暴力活动，即便是合法的也是恐怖主义。”因此，美国的恐怖主义定义具有宗教和民族属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将抵抗运动认定为恐怖主义。对于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对平民的屠杀，美国视而不见，却将阿拉伯的抵抗运动视为恐怖主义。这种观点在阿拉伯世界带有普遍性，即将美国对阿富汗的态度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相对比，将美国打击阿富汗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权和支持以色列相对照，将以色列的行为和袭击美国的恐怖主义行为相类比，这使很多阿拉伯思想家想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于1993年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文明冲突》一文，认为“如果说19世纪的特点是美国的国内冲突，即南北战争，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将是文明的冲突”；“苏联的解体使西方失去了共同的敌人，21世纪伊斯兰将是西方新的敌人”。随后他在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亨廷顿的论点很有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内对文化、思想乃至政治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亨廷顿在《外交》上的文章是1947年乔治·凯南在该杂志发表遏制理论之后最好的文章。

美国总统布什在最初的讲话中把对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称为“十字军战争”，尽管他很快收回了这种说法，但是这仍然被阿拉伯世界视为文明冲突论的注脚。黎巴嫩《风帆》周刊以《是的，就是文明冲突》为题发表社论，回顾了西方国家对阿拉伯国家的殖民主义侵略，认为西方自视为文明和进步，将非西方国家视为落后和不文明。西方和非西方之间的分歧和冲突由此产生，而这正是

西方一手造成的。该文引用了亨廷顿“文明冲突”的论断：各民族和各文明不仅要获得显赫的地位，而且要阻止其他民族和文明获得这种地位。然后质问：“西方所作的不是阻止别人进步，以便其自身保持文明和进步而让别人一直处于落后、受压迫、游牧状态吗？”第三世界各国人民抗击了西方的殖民主义侵略，但是西方又通过经济活动进行新殖民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西方的文明概念就是控制。而阿拉伯民族有自己的文明概念，即在真主启示的范围内组织人类生活的一整套人性的价值观念。阿拉伯世界和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只要西方坚持亨廷顿的文明观念，那么冲突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埃及作家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马布鲁克指出：只要存在仇恨，亨廷顿所说的伊斯兰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就是真实的。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利益和享受，伊斯兰文明的核心是为了全人类在今世和后世的幸福而利用世界，这是两种文明的根本矛盾。只有伊斯兰的意识形态有能力对抗西方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种矛盾在目前有三种表现：美国和西方支持犹太复国主义政权，通过扩大全球化体制加强西方对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西方阻止在世界任何地方建立伊斯兰政权。黎巴嫩诗人阿卜杜·凯利姆·纳伊姆认为：美国是要把世界美国化，把全世界变成“美国产品的消费者和美国文化的消费地”，这是新殖民主义，阿拉伯地区所受危害首当其冲。因此阿拉伯应当首先起来与之斗争，并与全世界的斗争者组成联合阵线。他说：“我们别无选择，要么抵抗，要么接受奴役和掠夺。”

但也有不少人对文明冲突论持否定态度。黎巴嫩十叶派宗教学者阿亚图拉·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勒拉认为，目前美国对

阿富汗的战争不是反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而是“利益之战”，目的在于发泄自己的怨气，同时是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中加强自己的地位。埃及学者萨拉赫·甘苏赫博士从理论上对文明冲突论进行剖析。他认为历史本身和对历史记录是不同的，记录历史往往是围绕某个核心或线索将历史事件组织起来。对9·11后的历史发展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方式，预期最后的结果是困难的，目前最好的工作就是客观地记录。但是，文明冲突论已经成为理解历史的一种线索。“一种思想，即便没有逻辑和证据，只要相信的人多了就会变成客观现实。”亨廷顿“作为职业政客和实用主义思想家，他关注的不是一种思想的客观真实性和内在逻辑，而是这种思想有利于美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实际效果”。文明冲突论的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即不在乎事件本身的真实，而关注是否相信这种真实。文明冲突论的目的是动员最大多数的欧美民众，激发他们的热情参与对抗。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为这种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他们不是面向未来的，其价值取向是面向过去的，把已经逝去的时代作为黄金时代，并把自己狭隘的思维和极端的思考强加于那个时代。他们将世界划分成两个部分：穆斯林和异教徒，而他们所谓的穆斯林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以伊斯兰或者纯正的伊斯兰自居，使用各种手段反对非穆斯林和与他们观点相左的穆斯林。因此，文明冲突论是美国利益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想行动相结合的产物。无论是布什还是本·拉丹都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所谓的文明冲突其实是“愚昧冲突”。<sup>[1]</sup>

与文明冲突论相对的是文明对话的主张。埃及伊斯兰思想家穆罕默德·阿马拉博士认为，西方文化中有反对伊斯兰和穆斯林

的思想，在9·11之后这种思想倾向有所抬头。对此，既不能漠视，也不必挑战，而是应该面对现实，以理性和开明的方式研究对策。无视西方的存在行不通，屈从西方的这种敌意则是灾难。因此“必须建立同西方人的对话”。伊斯兰国家内部僵化和暴力的思想潮流无论在规模还是影响上都是有限的，是西方和依附于西方的宣传予以了夸大。要通过对话改善伊斯兰世界在西方心目中的形象。在伊斯兰世界，要求进步和革新的中庸而温和的伊斯兰是主流，僵化的伊斯兰影响有限。只有这样，才能使西方抛弃将伊斯兰世界整个视为恐怖主义的看法。伊斯兰思想界需要做的就是阐明上述问题，将之纳入同西方社会思想机构进行对话的日程表。也门协商会议议员、萨那大学讲师阿卜杜·马立克·曼苏尔博士指出，伊斯兰同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交流古已有之，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只能使双方有识之士努力“保证对话的大门敞开”，而西方积极了解伊斯兰将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未来的发展要求双方增加沟通的桥梁，未来的一代要善于展示积极的东西并为消极的东西道歉。阿亚图拉·法德勒拉认为尽管西方传媒对伊斯兰进行了攻击，将伊斯兰视为西方新的敌人，但是没有理由为伊斯兰担心。所有的一切都不能消灭伊斯兰。这些事件也存在很多积极的成分。首先，布什和布莱尔等西方国家的首脑宣布伊斯兰不是恐怖主义的宗教，而是宽容的宗教，不能将恐怖主义归罪于本国的穆斯林。其次，这些事件促使世界阅读有关伊斯兰的著作，在西方，有关伊斯兰的著作尤其是《古兰经》已经脱销。同时，一大批穆斯林也开始热切关注伊斯兰的问题。法德勒拉主张文明之间的对话。他相信，世界上还有一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以客观和理性的方式思考问题。

应该创造一种文明对话的文化状态。目前需要文明对话，但是政治冲突阻碍了这种对话。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与文明冲突抑或文明对话无关，而是世界上的压迫者根据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进行政治冲突的问题。

上述学者为阿拉伯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提出了文明对话的要求，有些学者更进一步提出文明对话是阿拉伯文化自身发展的要求，文明对话不仅是阿拉伯与西方的问题，更是全人类的问题。黎巴嫩学者阿迪卜·萨阿布博士认为：“阿拉伯属性是人类总体属性的一部分，因此必须了解各个时代属于世界性文明的人类成果，比如希腊文明、远东文明和欧洲文明。这使文化更为宽广和深厚，在人类心中创造真正的宽容，使我们认识到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人性，离开它，宗教的、民族的或是其他的任何特性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既然阿拉伯文化做不到这一点，那将永远处在错误的开放和错误的封闭之中。很遗憾，这正是目前正在发生的。”学者詹·萨里麦指出：民族和国界已经不能将世界分开，任何一国发生的事情都会对他国产生影响。“阿拉伯文化已开始大步走向世界”，这就像魔瓶中放出的精灵，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它回到过去的黑暗中。记者阿卜杜·卡迪尔·舒海卜认为，这次战争的积极影响使知识分子更加关心文明对话的思想。之所以要进行文明对话，就是因为地球和整个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小村落，由于巨大的进步，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已处于密切的互动之中。

无论是文明冲突还是文明对话，要的是阿拉伯社会文化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阿拉伯思想界并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而是深入到阿拉伯社会思想文化的内部，对阿拉伯世界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阿拉伯人》报执行主编阿卜杜·哈利姆·金迪勒指出：苏联解体后，阿拉伯文化界和政界要么转向伊斯兰思想，即封闭在传统之中，要么沉浸在美国模式之中。事实上，阿拉伯国家的总体思想倾向转向伊斯兰比金迪勒认定的要早。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人战败使阿拉伯世界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产生了怀疑情绪，1970年纳赛尔去世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失去了自己的领袖。此后，阿拉伯思想界和大众文化开始越来越多地从传统文化根源中寻求对社会发展问题的答案，伊斯兰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引发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发展的高潮，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苏丹国民议会议员希布尔·尤素福·努尔·达伊姆博士认为，9·11事件与打击阿富汗对伊斯兰运动的影响可能有两个方向：一是极端、反叛和冲突的潮流，其动力是失望和不公正；二是温和的潮流，其动力是自信。其中第二种是根本，因为这一宗教的特性是建立在温和和中庸基础上的。历史学家阿迪勒·塔伊菲博士认为，伊朗、苏丹和阿尔及利亚模式已经失败，人们在阿拉伯伊斯兰的宗教话语中感到了一种发展，即“呼吁尊重多元性和与其他文明的对话”，人们将看到“极端伊斯兰运动的退潮和衰落”，“温和的伊斯兰将日益推广。”他认为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亚洲伊斯兰社会和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基础不同。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存在及其庇护极端伊斯兰组织的行为，表明伊斯兰主义思想在阿拉伯世界不像在阿富汗和其他亚洲国家那样有市场，这是因为亚洲的伊斯兰社会感到有表达信仰归属感的持久需求，而阿拉伯社会的伊斯兰归属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亚洲伊斯兰要反复强调行为的宗教属性，其结果就是以宗

教合法性为基础的政治运动。这样的宗教运动本质上没有脱离苏菲教团的框架。而在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主义运动具有城市性，在城市化过程中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无法融入城市，为了避免在边缘化中迷失，于是自我封闭，坚守宗教。阿拉伯世界的宗教运动和原教旨主义运动大多发源于大城市的贫民之中，成为在占支配性的城市话语中表达乡村自我的手段。这种差异导致“亚洲的伊斯兰比阿拉伯的伊斯兰更多地接纳极端”。因此，塔利班式的极端伊斯兰并不适用于阿拉伯世界，温和伊斯兰正在日益发展。<sup>[2]</sup>埃及思想家加麦尔·班纳指出，伊斯兰思想从内部受到的伤害甚于来自外部的伤害，伊斯兰思想阵营存在真正的危机，那些事件应该成为警钟，指出改革的必要。极端伊斯兰思想躲在蜗牛壳里，不能面对时代的挑战，应该从统治极端运动的思维中解放出来。这些学者认为以伊朗、苏丹和阿富汗等现代伊斯兰主义政权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为代表的社会发展模式日趋极端和僵化，是失败的模式，极端的伊斯兰将被温和的伊斯兰取代。

阿拉伯思想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9·11事件和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标志着美国模式的失败。女作家阿卜莱·鲁维尼认为，这场战争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将我们从美国文化的控制下稍稍解放出来，打破了美国神话及其人权、民主的谎言，打破了全球化，这场战争戳穿了美国模式。阿卜杜·哈利姆·金迪勒说，9·11之后的美国不再是以前的美国了，它不再将铁拳藏在丝手套里面了。“美国化”不再是令人神往的美国梦。9·11之后的美国失去了威严，不再具

有吸引力了。苏联解体之后，一些阿拉伯政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接受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现实，试图实现和平；对内清洗有全面社会计划的政党，只允许人权、发展和思想领域的专业集团在市民社会的名义下存在。而事实上，这一切都失败了，抵抗以色列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起义影响着阿拉伯民众，反对派在市民社会的名义下发展起来。总之，“美国梦破灭了”。作家瓦希德·哈米德认为，美国在战争中无论胜败，阿拉伯文化都将趋向原教旨主义思想。美国的失败就是原教旨主义的胜利，而美国的胜利则是异教徒的胜利，那更能促进极端原教旨主义思想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在关于社会发展模式的探讨中，阿拉伯思想家们思维方式的基础呈二元论，即认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存在着美国模式和现代伊斯兰模式两种对立的模式，非此即彼，一方的胜利就是另一方的失败。美国模式被其反对者视为世俗主义、文化依附、支持阿以关系正常化三者的混合体，目的在于消灭伊斯兰的价值观、历史传统和现实存在；而现代伊斯兰主义模式则被其反对者视为僵化和极端，是进步和自由的敌人。事实上，这种争论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问题的一个表现，传统性和现代性分别被直观地简化为或对等于现代伊斯兰主义模式和美国模式。这种思维方式中简单化、标签式的二元论不利于阿拉伯思想和社会的发展。

注 释：

[1] 萨拉赫·甘苏赫博士：《文明冲突，自我实现的错误预言》，载埃及《新月》月刊，2001年11月号。

[2] 阿迪勒·塔伊菲博士：《亚洲的伊斯兰比阿拉伯的伊斯兰更多地接纳极端》，载《中间》周刊，第513期。

